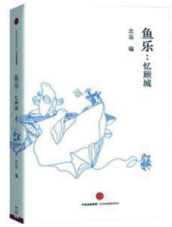


新 | 书 | 推 | 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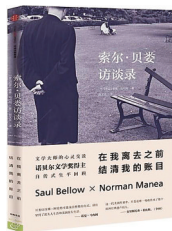
《鱼乐：忆顾城》



编者：北岛  
出版：中信出版社  
时间：2015—8

顾城(1956—1993)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,诗作纯净自然,一句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……”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。他的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西班牙、瑞典等十多种文字。  
《鱼乐：忆顾城》是顾城的友人所创作的怀念文集,包括11位知名的作家、诗人、学者和译者所创作的纪念顾城逝世二十周年的回忆性散文,如舒婷、王安忆等;更收录了66张珍贵历史图片,全面立体地展现了顾城的诗歌人生。  
北岛,1949年出生,本名赵振开,诗人、作家。

《索尔·贝娄访谈录》



作者：「罗马尼亚」诺曼·马内阿  
出版：三辉图书·中信出版社  
译者：邵文实  
时间：2015—6

1999年,波士顿大学,两位当代最重要的东欧流亡作家索尔·贝娄与诺曼·马内阿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,内容涉及贝娄的家庭、成长、信仰、犹太人的美国化,以及创作、阅读、爱情、友情等诸多方面。某种意义上,它成为了一部索尔·贝娄自述的珍贵个人传记。  
两位背景相似、惺惺相惜的犹太作家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对话中,回顾了贝娄作为犹太人与移民两重身份在美国的经历、创作与犹太家庭生活,以及美国街头经历,留下了一组生动而珍贵的时代剪影。  
诺曼·马内阿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,五岁时随家被遣送到特兰西瓦尼亚集中营。马内阿是当今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罗马尼亚作家,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。  
索尔·贝娄,美国作家。索尔·贝娄被认为是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小说家。曾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,一次普利策奖;1975年,还以“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《大国空村》



作者：程明盛  
出版：暨南大学出版社  
时间：2015—7

媒体人程明盛历时4年乡土调查、几易其稿创作完成的24万字大型纪实文学作品。本书以作者的家乡为点,以农村城市化为线,生动再现了中国农民诀别式迁徙后的内部瓦解,以及亲酬定律、乡酬定律下的异地重构,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浓缩版乡村命运图,为时代作证。本书一经出版便引发社会热议和舆论关注,在读者间产生广泛共鸣。

《南华录》

录鬼簿·烬余录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陈均

与之相当的奇书。诸多怪事,以下随意列出几则吧。

项元汴:早年用沉香做了一张床,兴冲冲送给一位中意的青楼女子。结果因重逢时该女对自己冷淡,将沉香床焚烧。项元汴的天籁阁是全国闻名的藏书楼,里面的藏书及各种精品不计其数。

屠隆:当小县令时,宴请《浣纱记》作者梁伯龙,场上正演《浣纱记》,听到曲子里有“水词”,辄灌作者一口污水。屠隆后来得梅毒而死,因汤显祖写诗提及,结果后世也有人考证汤显祖也得过梅毒,成为悬案。

汤显祖:《临川四梦》的作者,其中以《牡丹亭》最为人所知,四百年来,中国的言情文学,除《红楼梦》外,就以《牡丹亭》最为特出。据说写至小春香怀念杜丽娘时所唱“赏春香还是旧罗裙”时,家人不见汤氏之身影,一找,却见汤氏在院中柴堆上哭泣。汤氏任遂昌县令时,挂印而别。

祁彪佳:李自成和清兵攻取北京时,还在家苦苦营造他的寓园。后因清朝征召,自沉而死。

董说:《西游补》的作者。虽是《西游记》的续作,却另筑了一个文人的“异想世界”,他的屋子里摆满了镜子,号称“万镜楼”,所以也给小说里闯入青青世界的孙行者安排了一个“万镜楼”的场景。

黄周星:据说是《西游证道书》的修订者之一,也是现在所通行的《西游记》的最后定本的改编者之一,或许是唯一能确定的作者或编者(以前所说作者,丘处机是黄周星等人伪托,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其实是游记)。他曾构思“将就园”,据说其方案被天庭采纳。他最后也是自沉或绝食而死,不知是为了求仙还是因为殉明,或者两者皆有之。

……

它是晚明文人的“心史”,繁华落尽满悲惶

《南华录》的副题是“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”,想必也是有成为晚明文人的《世说新语》版的当代书写者的志向。

在一处访谈中,作者赵柏田曾经这样描述魏晋名士与晚明

文人的差异:

而魏晋人的狂,赵柏田理解为一种放诞和任性,“大雪天坐一夜的船去看朋友,兴尽而返,也不管是不是见着了朋友,驾着个车到处去走,没路了大哭着回来。魏晋人还是挺‘萌’的。但看了明人的‘狂’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徐渭拿锥子刺脑袋,自碎宰丸;李贽拿刀片切喉咙,拿身体自残,都是极端暴力,说是离经叛道,要挣脱名教藩篱,实际上是心性的畸变。

这段话说起来有道理,但还算不得精准。魏晋与晚明确实有气质上的差异,这是时代使然,但并非是可以截然区分,譬如张岱就有雪天游西湖,在湖心亭忽遇数人,痛饮酒之快事,比拟魏晋名士,其狂其逸也不相上下。而黄周星有诗云:“高山流水诗千轴,明月清风酒一船。借问阿谁堪作伴,美人才子与神仙。”

赵柏田在重述这些晚明文人的往事之时,虽然津津乐道的是物质文化,是生活史,但其意却是“心史”。也即,晚明的文人、士大夫为何如此生活?为何会有如此的“心性的畸变”?这些奇闻逸事,这些怪癖大全,它们来自何方?

在《南华录》中所书写的,虽然大多是文人阶层,并非“三教九流”,但文人阶层本身就复杂,有官员,有商人,有隐者,有收藏家、鉴赏家……而且,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,围绕着文人阶层的匠人、艺人、伶人、青楼女子等就不计其数了,亦因此显露了晚明文化与晚明社会的复杂又波澜起伏的图景。譬如,在写墨工罗龙文时,作者开篇对墨之历史及制作进行小小评说一番后,却迅速转入晚明倭寇与抗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,墨工罗龙文在诱降海贼徐海时只是一个小角色,然而在作者的叙述中,亦只是一个引子。作者更关心的显然是倭寇与通商的明代政治经济史,也更愿意去解读社会现象背后的成因。同样,在写汤显祖的一文中,作者对汤氏的经历及诗文并不详述,而感兴趣于《牡丹亭》的阅读史,及其文本的传奇。而这些书写,或许并不能仅仅归结于偶然,如作者所掌握的材料,或作者对这些文本及现象的话题的熟悉,也并不能归结于作者的

叙事(小说笔法,散文风格),而似更应从作者的心结或心志来理解,也就是作者在纷繁炫目的事件中所要探寻的,是知识分子(文人)在大时代中的命运,是人之命运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无论作者是先锋小说家,亦或是书写晚明的散文作家,其身份和志向都是统一的。

《南华录》里,着实是叙述了晚明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。一代是如项元汴、汤显祖、屠隆等,在帝国的体制中处于边缘的文人、商人、艺人,其志向不能实现,因而沉浸在戏曲、收藏及艺术里,了却一生。另一代则更为悲惨,明清易代之悲,遗民之恨,更给他们增添了生活的动荡与抉择的困难,使其生活更具戏剧性与悲剧性。如张岱、祁彪佳等。因此,在张岱的《自为墓志铭》中,当张氏道尽了种种繁华之后,笔调转为悲凉之极:

劳碌半生,皆成梦幻。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,避迹山居。所存者,破床碎几,折鼎病琴,与残书数帙,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疏苴,常至断炊。回首二十年前,真如隔世。

繁华世界,是非成败,顿时转空。然而,所有这一切,都和晚明的政治与社会密不可分。也即,晚明文人的种种狂狷,晚明生活的种种繁华,皆在于晚明的政治。作者曾写王阳明传记,曾写晚明的政治制度,此时再写晚明的文人与物质文化,或许更能理解与探寻生活背后的秘密所在。

作者解释《南华录》是“南方的精华”,而并非庄子的经典著述(庄子被后世封为南华真人,其书也被命名为《南华真经》)。但是,我以为,其主旨却是和庄子的“外道内儒”思想相通。也即《南华录》中的人物,大多是无所用,而“游于艺”,在丰富和痛苦的物质文化中寻求自身的自由与解脱。

因此,《南华录》又是《烬余录》,不仅仅是作者在宣叙繁华之时,又极写繁华落尽的悲惶,将让人欢喜的一切撕给人看;更在于,作为一位作家,一位帕乌斯托夫斯基式的“炼金术士”,在历史的尘土中拾得一朵金玫瑰,嚼饭哺人,尽管有些不足,但亦是很大的功德了。■



《南华录》插图